

翻译的共性与个性

The Universals and Individualities in Translating Practice



穆凤良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资助

翻译的共性与个性

穆凤良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有三部分内容:绪论、第一至五章为本论和第六至第八章为实践。绪论和本论看似专攻译理,繁杂宏大,其实,文理都在五行中,思想激活方显灵。六至八章融汇了理、工、人、文,适用于任何英语学习者。本书不为学术专一,乐见别有洞天:纵向由古至今挖掘译史深入浅出,文史哲胸有成竹;横向由东到西文本对比考证发微,真善美尽收眼底。因此,本书首先面向译界同仁、同学,但不仅局限为翻译专业使用,乐于跨界的读者也不妨一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共性与个性/穆凤良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118-09564-7

I. ①翻... II. ①穆...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2396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½ 字数 29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88540777

投稿电话: (010)88540635

发行传真: (010)88540755

发行业务: (010)88540717

前 言

偶遇一丝苦闷,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如同冬雷夏雪那样罕见。只是常人的感觉不会特别深刻,其排解也就不会特别困难。有的人只要可以去跳广场舞,就会高兴起来。有的人只要喝上一两白干或干红,就会高兴起来。有的人甚至哼唱一支曲子,就会高兴起来。有的人则会调动不同的语言,从无可言表到入木三分,把他有些沸腾的思想或滚烫的感悟表达出来,也会由衷地高兴。即便有冰冻的点滴,仍有机会化解成为无穷的乐趣。

翻译中的苦与乐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大多喜欢顺畅的人,说顺畅的话,做顺畅的事。斡旋时如果一时语塞会感觉脸面尽失,融入时如果一时受阻会感觉挫败难过,鉴赏时如果思路狭隘会感觉自惭形秽。这些只是头三脚的难踢感觉,接受翻译的训练会明显地有助于克服上述的尴尬。因为翻译是养成全球意识的有效渠道,是扩大思想赋权的得力杠杆,全在于译者要接触出发语和目的语等各个方面,很难囿于单边或片面。

为了把两面贯通起来,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我于2009年出版了《逻辑比较与英汉翻译》,又于2011年出版了《译德载物》,都是为了排解阅读和翻译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今天这本《翻译的共性与个性》仍然是为了探讨在阅读中遇到的一丝不解,在翻译中遇到的一时失语,在表达中遇到的苍白无力而容易产生的一丝苦闷。出路就在于开拓视野,激活符号,力求贯通自然、人文、古今、中外,直至指点迷津,豁然开朗,尽享其中的乐趣。

在内容上,本书的前五章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操控”为热词的深度耕耘,广泛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因素,侧重于理论研究和翻译批评。一般而言,译者的“操控翻译”不同于商人的“操纵股市”。后者是恶意串

通、浑水摸鱼、欺行霸市。前者是在行规的范围内抑恶扬善,从善如流,直至生浩然之气,造千古名句,译不朽篇章。尽管如此,“操控”一词逐渐退热,译者主体性一词逐渐升温,而“主体性”的讨论说白了仍然是为了发挥译者的“操控”责任。在进一步发展中,换成翻译共性和个性的术语,似乎会相应减少来自业内的抵牾。

后三章则从我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摘录一些片段,以证明翻译的共性和个性是在许多社会文化的变量中需要译者“操控”或把握的两个常量。

其中第六章的“阅读理解与可译性”,原本是为了说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翻译练习。鉴于其中真有一些不可译性,所以,现在改作阅读理解的练习,目的有进与退的两个方向。进则可以迂回地解构不可译性,为升格到翻译练习做预热的准备。退则可以用于任何英语课程中的阅读能力考核,有些篇章很具挑战性,足可以拉开成绩等级的区分度。

第七章的“英译汉实践”来自近年来我留给学生的作业,涉及英美图书、期刊和报纸的科、教、文、卫热点,摘录几篇附上答案。为了减小篇幅,未附学生的回答。否则,对比起来会很有视觉的冲击力。

第八章的“汉译英案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努力,或努力的一个缩影。这部分除了翻译,还有记叙,还有抒情,即使不能获得同情,引起批评也远远好于缄默。

本书的目的是要证明,没有个性往往也缺乏共性,其掌控局面的机会常常十分渺茫,很难为缤纷的世界增光添彩。背离共性等于离群索居,不能融入社会生活,其获得共鸣的可能也就微乎其微了。

不久前,同学群中的冬野绿歌发布了一首容易引发共鸣的诗:

走过了春绿秋黄,

新岁又在白雪的冷峻中启航,

悄然的白发在劝说着遗憾,

快把大大的“无愧”写上!

该流汗时,未曾在阴凉处落脚,

该收获时,亦有过欣慰的激荡!

天天的,年年的,都聚集成丰富,

哪有尺子可丈量彼此的风光？
该流泪时，未曾在苦涩中萎靡，
该潇洒时，亦有过慷慨的释放！
点点的，滴滴的都编织了生命的澎湃，
哪双脚印，不凝结着爱的互帮？
面对这新岁的洁白，
让我把诚挚的祝福送上：
坦然，大度，风趣，慈祥，
要懂得感恩，
也要学会遗忘！

显然，这是一篇应时而生的祝福，运笔如此自由、顺畅、奔放、纯净得只剩下感动。我一方面佩服他笔耕不止，面对“尺子”不肯任其丈量的心气，足以励志；另一方面在跟帖中我佩服他为“白云生处，启迪人生”，并附上一首七绝：

云生水启雾茫茫，
韬光养晦见沈阳，
而今发白心犹在，
未减昔日少年狂。

诗句在不经意间透露了他的名字为云启，年龄近花甲，地址在盛京等一系列算是隐私的信息。同学一场，我想他不会在意我略带嫉妒以至于剑走偏锋的措辞。客观一点儿说，他何须韬光养晦，早就已经在大放光芒。我请他赏光让我引用几行他在群中的发布。如我所愿，他慷慨地让我借光，结果如同月亮找到了太阳。

我喜欢捕获这种灵动的感悟和思想的闪光。一贯的立场也表现在本书中：我依然没有按照语法顺序或翻译技术来安排章节。反思以往，至少我在评阅作文时最怕想法和表达的雷同。将心比心，我不想与人雷同来浪费读者的时间。只要用心自有心得，所以，本书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体验。

沿着上述的出发点，这本书终于问世了。伴随我的是一种从未体验

过的感悟、豁达和感动。感悟得益于众多师友的热心帮助，豁达得益于与清华学生的教学相长，感动得益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研究项目》的后期资助。我特别要感谢多年以前我在岭南大学翻译系的诸位导师，他们遇到我才接触了冥顽不化的迟钝，我遇到他们才见识了学富五车的通达。

鉴于认知的动态属性，本书可能存在疏漏处，偏颇处，或不当之处，还望译界同仁及读者朋友斧正。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appear to be '穆旦' (Mu Dan).

2014年3月31日于北京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缘起	1
一、研究动机	2
二、预期目标	2
三、理论架构	3
第二节 关键词界定	3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章节简介	6
一、研究命题	6
二、研究方法	7
三、章节简介	8
第一章 文献探讨	10
第一节 “翻译操控论”的由来	13
第二节 “改写”的诱因	16
一、因素作用研究	16
二、改写论	21
第三节 操控学派的盟友:文化派和后殖民主义	22
一、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22
二、劳伦斯·韦努蒂的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观	29
第四节 “信、达、雅”	33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	34
二、文质相争	36

第五节	小结	40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翻译	43
第一节	意识形态界定	43
	一、意识形态的定义	45
	二、意识形态的提出及其普遍性	48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翻译	51
	一、无意识与目的性	52
	二、动态性与翻译选择	54
	三、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意义、作用和渗透方式	56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与泛意识形态的误区	68
第四节	小结	71
第三章	严复“信、达、雅”的意识形态意义	72
第一节	《天演论》的翻译与“信、达、雅”的操控	72
	一、翻译选择	72
	二、操控翻译过程	76
	三、在系统论的框架中解读“信、达、雅”的意义	83
第二节	《群己权界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94
	一、从王朝语境说起	95
	二、中庸立场	98
	三、自我表白	100
	四、张扬意识形态	102
第三节	借壳生蛋的《政治讲义》	107
	一、严复《政治讲义》的背景	107
	二、借壳生蛋与引进政治学	109
	三、逆向思维	112
	四、《政治讲义》的定性	118
第四节	小结	120

第四章	鲁迅、严复和梁实秋的意识形态比较	122
第一节	鲁迅和严复的相似处	122
	一、译经意识与人文关怀	123
	二、翻译选择	126
第二节	鲁迅、严复、梁实秋:相异的观念	130
	一、维护制度的严复和挑战制度的鲁迅	130
	二、严复的实证主义和鲁迅的理想主义	131
	三、鲁迅与梁实秋的意识形态论战	134
第三节	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战	139
	一、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的核心问题	140
	二、鲁、梁的“两条路”之争	142
	三、鲁译、林译以及由此引起的梁实秋的困惑	147
第四节	小结	156
第五章	翻译的共性、个性与批评	160
第一节	系统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161
第二节	翻译的共性和个性	170
第三节	结论	175
第六章	阅读理解与可译性	181
第七章	英译汉实践	229
第八章	汉译英案例	256
参考文献		279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缘起

翻译学的魅力在于它既古老又年轻。其古老的一面,从语内翻译算起,是随人类的认知活动一起发展的。待到人类使用文字,例如甲骨文,需要专业人士来构建、刻写、阐释、翻译或解构,逐渐演变出两类翻译,如梁启超所归纳:“一、以今翻古。二、以内翻外。以今翻古者……求诸先籍,则有史记之译尚书。”(梁启超,1989a:1)以内翻外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莱顿南说:“人类从诞生起就生存在解释中。”(Lehtonen,2000:7)比古恩讷特等人说:“所有交际行为都是翻译行为。该行为包含了人类交往和理解世界的秘密。”(Biguenet,1989:ix)纵向地看,翻译行为可谓历史悠久。

翻译学年轻一面的表现在于它的理论正名较晚。正如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翻译理论开始于无名,从属于语言和文学。但是,经过20世纪的酝酿,翻译理论开始呈现无限的生机。

理论的生机往往来自本身的开放性。由于语言学理论、文学批评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都在向翻译学渗透,翻译学的理论水平在近30年来得到迅速提升。同时,翻译的流派和研究的视角也开始多元化。互相的批评也频频展开。在翻译理论流派还不算太纷杂的时候,纽马克就已经表示不满了,他说,“事实上,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而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和仍将拥有的有关翻译过程的知识”(Newmark,2001:19)。当翻译理论开始纷杂起来时,谷特认为,翻译思想还只是“一堆意见”,还“缺乏大量的有分量的原创性”(Gutt,1991:1-2)。八年后,赫曼斯发出同感,他仍然认为,“今天,如果在常规的翻译研究中还存在明显的匮乏,就在于理论层面的匮乏”(Hermans,1999a:159)。

为了推动翻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张南峰建议译界“放弃单一的标准,起码应该容忍不同的翻译观”(张南峰,1995:4)。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是不人为地抬高理论准入的门槛。说到底,“理论无非是实践的分支”(Charles Bernstein quoted in Hutcheon,1988:222),而不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真理一旦绝对化就注入了太多的主观成分,从而减少了客观性;理论一旦绝对化恐怕也会相对于真理而渐行渐远。因此,真理或理论须是动态的才能成其为真理和理论。二是促进开放的兼收并蓄。各家的观点也好,信念也罢,甚至包括意见,可能很不成熟,但未必不是理论化的良好开端,或者它们至少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媒介。三是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近年来的翻译理论化的进程中,争议是最具活力的因子。它往往会成为理论发展的契机之一。译界的快速发展就因为它一向不乏争议。颇受争议的“翻译操控论”就是我们讨论的切入点。

一、研究动机

理论之争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善、美。争论的结果是视角的不断转换和视野的不断扩大,乃至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于是,译界呈现史学转向(historical turn)^①、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译者转向(the translator's turn)(Robinson,1991)的多维度探索。面临如此纷繁的路径,我们将以其中的“翻译操控论”为例,分析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解读“翻译操控”过程中的谜团、共性和个性。

二、预期目标

通过对“翻译操控论”的分析,我们希望看到理论推陈出新和历史继承的两面性,从而认识翻译操控具有普遍性呢,还是具有特殊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据此,我们或许能够援引历史来解释现在,也能够用现在来解释历史。

① 史学转向:早在以语言学转向为特征的60年代就有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历史主义的代表作(Kuhn,1962)。此后,史学转向不但没有淡出,而且格林布莱特在1982年《英语文艺复兴中的权力形式》导言中首次提出“新历史批评”,为文学批评的史学转向注入了新的动力(Greenblatt,1982)。

具体到与现在对应的历史截面的选取,书中将选用严复和鲁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来分析翻译操控的属性和特点,即用“翻译操控论”的方法来分析严复和鲁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重新诠释过去因为错位的理论或引用理论不当而引发的令人费解的历史疑团。

三、理论架构

在纷繁的翻译理论梳理中,本书将侧重于“翻译操控论”的透视,靠意识形态线索贯穿全文。因为意识形态即使不是“翻译操控论”的核心问题,至少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是本书开展对“翻译操控论”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将从严复、鲁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看意识形态作用,以此为根据评估翻译操控的痕迹。书中关注的译界研究成果包括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的因素作用研究,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论域,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观和提奥·赫曼斯(Theo Hermans)的翻译操控论。

本书的定位是要澄清意识形态容易引发的争议,研究操控学派的理论意义,并且在世界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探讨翻译的普遍适用论、翻译共性和翻译个性的矛盾运动,以期深入认识翻译的本质,丰富翻译实践。

第二节 关键词界定

在正式讨论之前,先界定以下相关的名词,以便于在正文中使用时保持一致性。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作为政治、经济或其他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是反映个人、组织、阶级、社会需要或文化愿望的思想意识和。针对译者的翻译实践,勒菲弗尔描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介入方式,一种是“译者自愿选择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通过某种赞助形式方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决定译者在翻译中将要采用的基本翻译策略(Lefevere, 1992: 41)。现在看来,人们主动或自愿选择意识形态的概率更为普遍。

赞助人(patron):支持、保护、维护某人、某事、某机构、某事业的资助方。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赞助机制有三要素,一是“限制形式和主题选择的意识形态要素”;二是赞助方要确保作家和译者维持生活的经济要素;三是帮助作家和译者获得社会地位的要素。当文人的经济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意识形态因素时,或者至少在未经官方认可的文学精英的眼中,即使经济成功也不一定随之带来身份地位时,赞助方可能是分化的或多元化的;赞助方可能是一体化的,例如当赞助方同时掌控着赞助机制的三要素(Lefevere, 1985: 228 - 229; 1992: 16 - 17)。

诗学(poetics):是文学规范和社会允许它存在的主流观念(Lefevere, 1992: 14),是从亚理士多德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学批评元素之一。当勒菲弗尔把诗学引进翻译因素的研究时,他参考了侯姆博格(Homberger)对诗学传统的归纳,第一方面,“诗生于情,诗人擅长以他的诗情感染听众和读者”;第二方面,“读者的感情表现一定在雅语和韵律中”;第三方面,“诗意必须具有语言明晰的特性,因为只有表达明确,才能传情达意给读者或听众”(Homberger, 1972: 78)。然而,传统的诗学定义受到现代派的修正和后现代的颠覆^①,所以,勒菲弗尔提出,“历史无法证明任何事情,因为人们主要是在系统范畴的某些制约下制造历史”(Lefevere, 1992: 37 - 38)。这就把诗学的讨论纳入到系统论的思维中。

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指话语或论据中所涉及的所有中立的客观的实体,涉及文本内的语言逻辑、习语、民族语言相对于目的语所特有的异质性和文本外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按照勒菲弗尔的功能分析,意识形

① 传统的诗学定义是属于本质论的术语(essentialistic term),具有元定义的规定性,在现代派时期,庞德提出意象派的诗学观来补充传统的诗学意义,他在《一位意象派者所提出的几条禁例》中提出,“(1)写诗要用‘意象’,要写得具体、确切,避免抽象;(2)形式上要创造新的节奏以表达新的诗情,认为自由诗体可以更好地表达诗人的个性,但也不反对用其他诗体;(3)要写得精练,浓缩,不用废字,不用修饰;(4)要写得明确、清楚,不模糊、含混;(5)使用通俗的语言,用准确的词语,不用装饰性的词语;(6)题材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现代生活可以入诗”(郭建中, 2000: 44)。后现代颠覆任何本质论的元哲学地位。例如,朦胧诗就是与传统诗歌定义格格不入的。

态是解决原文中的论域和语言表达问题的决定因素(Lefevere, 1992: 41)。

多元系统(polysystem):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是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埃文-佐哈尔融合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交际理论, 提出多元系统论。根据埃文-佐哈尔对多元系统的定义:

在元理论层面上, 假定能观察到的一个因素是否属于或关系到一组假设的因素(集束、领域或系统), 该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为它假设出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系网。因此, 这组因素不再被视为现实中的孤立个体, 而是依存于我们准备为它们提出的关联。(Even-Zohar, 1997: 17-18)

以翻译文学为例, 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 而是在多元系统中由文学系统支配的一个子系统。译本与多元系统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关联性: 一是目的语文学选择原文的途径, 选择的原则不可能不与文学的目的语系统产生关联; 二是它们接受具体的规范、行为和政策的方式, 简言之, 即它们与目的语的共存系统建立关联后, 便可使用文学的形式库(Even-Zohar, 1999: 192-193)。于是, 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就可以纳入到关系网的系统思维中, 它们互相并不独立, 而呈现多元开放状, 交叉重叠, 互相依存, 整合为统一体。同时, 这个统一体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体融入“大多元系统”(mega-/macro-polysystem), 直到形成世界文化这个最大的多元系统。多元系统论凭借多元系统平台, 以中立的立场, 研究翻译的性质、级别、模式、表现等等。

描述法(descriptive approach): 彻斯特曼曾经归纳出三种翻译研究的途径, 分别为描述途径(descriptive route)、规定途径(prescriptive route)和恶化途径(pejorative route)(Chesterman, 2004a: 34)。本书后面会再提“规定途径”和“恶化途径”, 现在来解释翻译的描述途径。早在 1972 年, 霍姆斯就提出了翻译的描述法: “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描写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翻译过程和译本的种种现象, 二是建立普遍原理, 以解释和预测上述现象”(Holmes, 1999: 176)。霍姆斯没能落实这两个目标就辞世了, 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在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中间接地落实了, 第二个目标, 即“建立普遍原理”, 一直也是图里的主观追求, 对于别人而言恐怕亦属于主观追求。因为描述翻

译学是面向规范的,而客观实践与规范总会有些许的距离。

描述法的主要功能是描述、解释和预测翻译的客观现象,分析介入操控翻译的诸因素,所以,“在选择主题、提出研究发现或拒绝为所谓‘适当’行为下结论时……描述翻译学倾向于避免参照自己的价值判断”(Toury,1995:1,2)。

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是较晚加入系统概念中的颇具动态性质的成员。他们在系统论的框架中提出了“翻译操控论”,其核心思想含勒菲弗尔提出的因素作用研究、图里的描述翻译学和提奥·赫曼斯等人提出的翻译范式研究。该派认为翻译实践历来有扭曲和背叛原文的成分,因为“所有翻译都为某种目的对原文实施一定程度的操控”(Hermans,1985:11)。此说曾经引起热议。相左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主观上追求纯翻译,另一方面,即操控学派,在主观上不否认可以追求纯翻译的理想,但是在客观上,翻译的过程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时尚的背景。如果冷静观察下来,纯翻译作为理想来信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践中有太多的因素会参与翻译过程。正如杨全红的一本书,题名为《谁不想译名惊人?》,内容亦是如此,有严复译《天演论》为证。在正常的情况下,谁经手翻译都会由产生感悟,到深入理解,于是会负责任地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精确化,并用自认为是最恰当的载体,或者崇高、或者典雅、或者简约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所以,即使是强烈反对翻译操控的人恐怕也会在翻译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笔调,乃至被人指出操控的痕迹。不过操控阵线回应质疑的声音不够持久,也许是迫于压力,前期还在重点研究促成扭曲和背叛原文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操控学派,经由赫曼斯和图里等人的推动,后期的重心转向翻译规范的研究。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章节简介

一、研究命题

翻译一定有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可称其为共性。实践一定有个人的特点和痕迹,解读其为个性。至于应该多一些共性还是个性,涉及合理的控制。所以,本书在翻译理论的讨论中侧重于“翻译操控论”的研究,目的

是要揭示翻译操控的属性,到底是属于偶然性、特殊性还是普遍性的呢?为此,我们将援引严复和鲁迅的翻译来解释和评估翻译操控现象,以期对“翻译操控论”的可行性和局限性做出描述。我们还将利用“翻译操控论”的方法来分析严复和鲁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以期解开令人费解的历史疑团,诸如今人,例如谭载喜,对于“信、达、雅”的重重疑虑,并回答前人,例如梁实秋,尚未解决的鲁迅硬译的命题。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回顾操控学派的发展渊源中,将借助于讨论“直译”与“意译”,中国的“信、达、雅”,本雅明的“纯语言”和贝尔曼(Berman)的“纯翻译”等翻译理念,来审视操控的不同形式,既梳理操控阵营中的三个理论支柱,包含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因素研究,图里的描述翻译学和提奥·赫曼斯的翻译批评,又将在文化派的大范畴中分析与操控学派既有类似性又有差异的盟友,诸如与操控学派形成呼应和互补关系的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观和劳伦斯·韦努蒂的后殖民主义。

在解读操控学派的基础上,本书将突出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联性研究,其中包括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以便于展开对于意识形态的借鉴意义和认识误区的鉴别与讨论。

不理解历史根源就不容易理解现在,甚至使阐释陷入迷途。例如,脱离历史就很难理解“信、达、雅”的精髓。因此,研究历史是理解翻译活动的有效途径之一。虽然历史变迁具有不可逆转性(Pieters, 1999: 26),过去即逝去。但是,通过文本或记忆仍然可以激活历史话语,为翻译批评提供背景资料和渊源的考证。有鉴于此,本书将重温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严复和鲁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为了正确使用史料,本书将避免两类解读历史的误区,误区之一是人们倾向于抹煞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形成历史偏见。如同拉卡卜莱所说,“历史的现实不仅代表现实,它还补充它所描述的现实”(LaCapra, 1985: 62)。在文化重构或翻译过程中,既有历史的厚描,又有厚描的翻译。正如哈维指出,“翻译不仅反光,也生辉,不仅是现存社会文化接受系统操控的结果,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创新性和多种可能性”(Harvey, 2003: 46)。